

4 1985

党史资料

丛刊

总第二十五辑



封面装帧 范一辛

党史资料丛刊

一九八五年第四辑

(总第二十五辑)

上海人民出版社出版

(上海绍兴路54号)

新华书店上海发行所发行 常熟兴隆印刷厂印刷

开本 850×1156 1/32 印张 4.5 字数 105,000

1985年12月第1版 1985年12月第1次印刷

印数 1—9,200

书号 3074·727 定价 0.75元

内部发行

致 读 者

本刊自一九七九年创刊以来，迄今已有六载。在此期间，得到了广大读者的热情关怀和信任，我们借此致以衷心的感谢。

为了适应广大青年、干部、专业工作者和大专院校学习、教学和研究中国革命史的需要，本刊从一九八六年起，改名为《革命史资料》期刊，由各地新华书店公开发行。

《革命史资料》暂定为季刊，宗旨是：提供资料，传播知识，积累文化，交流信息。《革命史资料》刊载一九〇五年同盟会成立至一九四九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包括旧民主主义革命和新民主主义革命两个历史阶段的史料、专论、回忆文章、历史知识、教学经验交流、文摘书摘等，并相应设有多种栏目，努力为读者服务。

热忱欢迎广大读者向各地新华书店订购《革命史资料》，本社读者服务部也办理预订和邮购。

《党史资料》丛刊编辑部



2 023 3209 2

目 录

党史资料丛刊 目录

一九八五年
第四辑
(总第二十五辑)

致读者.....(3)

回忆录

我的良师益友.....陆志仁(4)

“八一三”前后的片断回忆.....周克(8)

北撤大连.....黎文(13)

专题研究

延安时期民主团结的典范

——陕甘宁边区参议会.....张志强(18)

试论中国共产党建党的特色.....邵秉正(25)

上海《新华日报》筹备出版被阻经过.....许映湖 王仰晴(46)

华中抗日根据地的第一个参议会.....附议(54)

上海——瑞金秘密交通线概述.....陈显强(56)

战后斯大林“不准革命”的原因初探.....王廷科(63)

解放前夕，我党情报部门策反国民党

上海市警察局机动车大队起义始末

.....上海市公安局公安史资料征集研究领导小组办公室(76)

对皖南事变中石井坑突围时间的考证.....刘以顺(80)

“一二八”淞沪抗战简述.....苏智良 朱华(83)

人 物

- 博古的早期革命活动 廖美珍 朱昱鹏 (92)
苏兆征与国际职工运动 褚倩红 卢 权 (98)
李超时与红十四军 王辅一 (109)

文 摘

和平解决西安事变期间周恩来和宋子文的几次谈判(117),邓小平主办“第二黄埔”(118),广州起义中的陈赓另有其人(119),陕甘支队是在何时组成的(120),有关南方局的组织沿革(121),叶挺独立团在汀泗桥之战中的作用(122),中国航空事业最早的一个摇篮(122),黄爱、庞人铨不是无政府主义者(123),陈独秀第三次被捕系国民党出面营救(124),美国对日本原子弹突袭始末(125)

读者来信摘登

关于国民党上海执行部成立的时间(王光远),我并未参加“社联党组”(李剑华),维经斯基未出席共产国际执委会第七次扩大全会(王晓伟)

- 总目录(一九八五年) (133)
《革命史资料》期刊征稿说明 (141)

党史资料丛刊 目录

一九八五年
第四辑
(总第二十五辑)

致读者.....(3)

回忆录

我的良师益友.....陆志仁(4)

“八一三”前后的片断回忆.....周克(8)

北撤大连.....黎文(13)

专题研究

延安时期民主团结的典范

——陕甘宁边区参议会.....张志强(18)

试论中国共产党建党的特色.....顾维正(25)

上海《新华日报》筹备出版被阻经过.....陈映湖 王仰箭(46)

华中抗日根据地的第一个参议会.....附议(54)

上海——瑞金秘密交通线概述.....陈显强(56)

战后斯大林“不准革命”的原因初探.....王廷科(63)

解放前夕，我党情报部门策反国民党

上海市警察局机动车大队起义始末

.....上海市公安局公安史资料征集研究领导小组办公室(76)

对皖南事变中石井坑突围时间的考证.....刘以顺(80)

“一二八”淞沪抗战简述.....苏智良 朱华(83)

人 物

博古的早期革命活动 廖美珍 朱昱鹏 (92)

苏兆征与国际职工运动 褚倩红 卢 权 (98)

李超时与红十四军 王辅一 (109)

文 摘

和平解决西安事变期间周恩来和宋子文的几次谈判(117), 邓小平主办“第二黄埔”(118), 广州起义中的陈赓另有其人(119), 陕甘支队是在何时组成的(120), 有关南方局的组织沿革(121), 叶挺独立团在汀泗桥之战中的作用(122), 中国航空事业最早的一个摇篮(122), 黄爱、庞人铨不是无政府主义者(123), 陈独秀第三次被捕系国民党出面营救(124), 美国对日本原子弹突袭始末(125)

读者来信摘登

关于国民党上海执行部成立的时间(王光远), 我并未参加“社联党组”(李剑华), 维经斯基未出席共产国际执委会第七次扩大全会(王晓伟)

总目录(一九八五年) (133)

《革命史资料》期刊征稿说明 (141)

致 读 者

本刊自一九七九年创刊以来,迄今已有六载。在此期间,得到了广大读者的热情关怀和信任,我们借此致以衷心的感谢。

为了适应广大青年、干部、专业工作者和大专院校学习、教学和研究中国革命史的需要,本刊从一九八六年起,改名为《革命史资料》期刊,由各地新华书店公开发行。

《革命史资料》暂定为季刊,宗旨是:提供资料,传播知识,积累文化,交流信息。《革命史资料》刊载一九〇五年同盟会成立至一九四九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包括旧民主主义革命和新民主主义革命两个历史阶段的史料、专论、回忆文章、历史知识、教学经验交流、文摘书摘等,并相应设有多种栏目,努力为读者服务。

热忱欢迎广大读者向各地新华书店订购《革命史资料》,本社读者服务部也办理预订和邮购。

《党史资料》丛刊编辑部

我的良师益友

陆 志 仁

彭柏山同志原是中共江苏省委分工联系“职委会”工作的。后来为了加强“职委会”的领导，一九三七年十月，王尧山同志向我们传达省委决定：“职委会”直属江苏省委领导，彭柏山担任“职委会”书记。当时我是“职委会”委员之一，和柏山经常接触，关系很密切，不仅常在一起开会讨论问题，个别谈心的机会也很多，在这相处不到一年的时间内，他给予我很多帮助，许多情况都是难以忘怀的。

自柏山担任“职委会”书记到他在一九三八年去新四军而离沪的这段期间，上海已沦为“孤岛”。为了适应当时形势和群众的迫切要求，我们采取了多种多样的组织形式和工作方法，在店职员群众中开展抗日爱国的宣传教育，群众运动发展很快，差不多每个星期有新的进展，新的变化。当时柏山特别强调要做好群众中人数多而社会地位低的下层店员工作。这是我们的基本群众，他们生活比较困难，还有各种封建家长制的店规束缚着他们。晚上，资本家常不准他们外出，甚至不准读夜校，参加社会活动的民主权利受到很大的限制。“职委会”对如何开展这部分群众的工作，进行了多次研究。一九三八年初，我们在总结群众运动经验的基础上，建立了以各业店员为主体的业余文化团体——益友社。柏山将负责“慈联会”的赵朴初介绍到益友社，进行上层统战工作，推动了一些同业公会的资方开明人士，支持群众的爱国活动。柏山又将负责

难民工作的周克介绍给我，参加了“职委会”所属的一个党支部，由我兼任支部书记。周克在难民收容所的工作中，发展了一些积极分子入党，并动员一部分人参加“益友社”的活动，以加强“益友社”的基层工作。这样，处于草创时期的“益友社”力量大大加强了，工作局面迅速地打开了。当时“益友社”以及店职员的其它群众团体（如银钱业联谊会、华联同乐会等）的蓬蓬勃勃发展，都是和柏山善于掌握群众运动的特点，贯彻中共江苏省委的方针分不开的。

柏山在主持“职委会”工作时期，我党已在毛泽东、刘少奇等同志领导下总结了白区斗争正反两方面的经验教训，党根据抗日战争新形势的特点，采取了新的方针和策略。柏山三十年代中期在上海做过地下工作，那正是王明“左”倾冒险主义错误统治全党的时期，他对于当时党所经受的困难和挫折，有直接而深切的体会。因此，他这时接受、领会和贯彻执行党在抗日战争时期的正确路线，是很自觉的。他曾几次对我说：“省委主要领导同志看问题很深远，能力强，水平高。”他主要是指当时刘晓同志正确贯彻党所制定的白区工作路线，使党的力量和组织在轰轰烈烈的群众运动中得到发展和巩固。柏山还很有感触地对我说：“现在进行工作，和抗战前截然不同，那时候我们搞工作，真是苦头吃足，你根本不能体会那时候党内斗争的复杂性。”我们“职委会”同志间很团结，大家敢于讲话、能发扬民主，这也体现出当时党组织领导的正确性。

一九三八年的春夏之交，柏山还在我家里住过一段时间，当时我住在浙江路老垃圾桥。一天，我乘电车回家，在下车往家走的路上看见柏山默默地走在我后面。他向周围不断观察，断定确实没有“尾巴”后，才向我招呼并说明因他所住弄堂内抓走了一个人，他的住处不安全而要住到我家来。于是我把他带到家里，他和我弟弟陆毅同睡一张双人床，弟弟睡上铺，他睡下铺。大约住了两、三个星期，没有发现危险而回家了。经过这一段时期的共同生活，

使我和柏山接触更多,互相更熟悉了。

我和柏山初次见面时,觉得他冷冷的,不易接近,但多接触后就感到他热情,诚恳,很肯帮助同志。我们相识不久,便成了无话不谈的知己。我起初只知道他叫陈常,后来才知道他姓彭,笔名柏山,是个作家。记得他手里常拿着一本《七月》杂志。他曾把他的短篇小说集《崖边》送给我。他和鲁迅也有来往,和我谈起过鲁迅曾借给他二十块钱,帮助过他。我那时候也爱读文艺作品,两人常对一些作品进行讨论。他抽空也写些东西,他说:“做党的工作,要掌握人的思想和特点,而文艺作品对人物典型的分析描写,对我们做思想工作者是有教益有联系的。”他的话给我很多启发,使我逐渐懂得熟悉社会,熟悉群众,是一个党的工作者必须具备的条件。

柏山分析形势、分析问题的水平,特别是他善于提出解决问题的具体措施,常令人折服,并受其鼓舞。当时我和顾准讨论问题时,常常发生争论,总是柏山耐心说理,帮助大家提高认识,统一思想。他和顾准有时也有争论,但事后从无芥蒂,仍然团结一致地投入工作。

他去皖南新四军军部后,我们长期没有见面。我弟弟陆毅和“益友社”的卓飞等同志,后来也参加新四军,在三野六纵队受柏山同志的领导,那时我从弟弟家书中还偶尔能知道柏山的一些消息。直到一九五三年春天,柏山调到中共上海市委宣传部工作,我们又经常见面了。那时我在市委党校工作。他很重视党校的教学工作,还帮助我们收集教材,亲自到党校做报告,并对改进党校的工作提出许多重要建议。

一九五五年,柏山同志因“胡风问题”的株连,蒙受不白之冤,凡熟悉他的同志都感到震惊和迷惑不解。此后,他长期身处逆境,只听说他在“流放”期间,仍然勤奋写作,为党为人民努力工作。“文化大革命”中我自己也身陷囹圄,当我身受种种迫害的时候,常会

回忆录

想到柏山,并为他的命运耽忧。不出所料,他终于在遭受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团残酷迫害后,含冤、含恨去世了。我深深为我们党失去这样一位饱经忧患而忠心耿耿为党工作的老战士而感到悲痛,也为我失去一位良师益友而怀念不已。党的三中全会以后,中共上海市委为柏山同志平了反,恢复了名誉,恢复了党籍。柏山同志作为一个真正的共产党人的高大形象将永远留在我的心中。

“八一三”前后的片断回忆

周 克

一、欢迎郭沫若归国

一九三六年冬,我根据党的指示由平津来到上海,从事抗日救亡活动。当时,中国共产党关于“停止内战,一致抗日”的政治主张,已深入人心。在党的领导下,上海各界、各人民团体声援和营救七君子的政治斗争波澜壮阔,人民群众的抗日情绪空前高涨。芦沟桥事变发生之后,蒋介石慑于民众压力及社会舆论,不得不于七月三十一日释放爱国领袖七君子,同时,取消对郭沫若的通缉令。

一九三七年七月二十七日下午,郭沫若只身回国。当时上海各报争相刊载郭沫若在加拿大皇后号邮轮上所作的《归国杂吟》等诗篇。郭沫若日记体的《由日本回来了》的文章也在人们中广为传诵。

与郭沫若同船回国的,还有国民党元老黄兴先生的儿子黄一寰(一九三四年在南京时,我们同在秘密学生读书会中活动,黄现为全国盲人协会会长)。

郭沫若抵沪后,受到上海各界人民的盛大欢迎。八月二日,上海两文艺团体举行联欢会,宴请郭沫若。郭沫若在宴会上作了慷慨激昂的发言,他说:

“此次别妇抛儿,专程返国,系下绝大决心,国势危殆至此,舍

全民族一致精诚团结，对敌抗战外，别无他道，沫若为赴国难而来，当为祖国而牺牲，谨以近作七律一首，聊表寸衷。”

郭在席上步鲁迅《惯于长夜过春时》原韵，挥泪赋诗一首，曰：

又当投笔请缨时，别妇抛雏断藕丝。

去国十年余泪血，登舟三宿见旌旗。

欣将残骨埋诸夏，哭吐精诚赋此诗，

四万万人齐蹈厉，同心同德一戎衣。

八月四日，他为蓬莱大戏院即将公演的《保卫芦沟桥》（由崔嵬、宋之的、阿美、于伶、石凌鹤等十七人执笔，夏衍、张庚、郑伯奇等四人整理，参加演出的戏剧和电影工作者近百人）写了题词：

“芦沟桥，它是不会失掉，在我们精神中的芦沟桥，那永远是我们的墓表。芦沟桥虽然失掉了，我们依然要保卫芦沟桥。”表达了郭沫若抗战必胜的坚定信念。

八月八日下午，由上海文化界救亡协会联合中国文艺协会上海分会、宪政协进会、编辑人协会、剧作者协会等团体在南市区尚文小学召开了欢庆七君子出狱及欢迎文化战士郭沫若归国的盛会。主席团有潘公展、胡愈之、张志让、朱青来、周剑云、谢六逸等组成。这是一次振奋民族精神、争取民族解放的大会。那天到会群众达两千余人，显示了上海人民同仇敌忾的力量。

当郭沫若、沈钧儒、章乃器、李公朴等步入礼堂，登上主席台时，全场爆发了暴风雨般的掌声，历三分钟不息。潘公展代表主席团讲话，并说明邹、王、史、沙等四人留在南京不能到会。

郭沫若的演说，似诗似剑，铿锵有力，激起了群众心中的狂澜。他自称：“我是‘十年退伍一残兵，今日归来入阵营’，不配受欢迎，而努力救亡工作的沈钧儒、章乃器、李公朴诸先生，才配受欢迎。”

郭礼貌地转过身向坐在主席团上的潘公展作了一个揖，然后幽默而又含蓄地说：“我多年来不能在祖国的土地上活动，政治上

回忆录

被迫出国，潘先生，你是知道的，你们不许我活动，现在我回来了。”

接着，他针对国民党消极抗日的政策作了无情的鞭挞，他说：

“过去，有人把生命财产看得太重，所以没有抗日的决心，生命看得太重，就是怕死，财产看得太重，就是爱钱。岳飞有句名言：‘文臣不爱钱，武臣不怕死，则天下太平矣！’我敢说：‘人人不怕死，人人不爱钱，则敌人打倒矣！’”

继而由沈钧儒先生代表七君子致词，表示愿为抗战“牺牲一切，贡献全部精力，为国效死”。章乃器先生继沈后发言，大意为：我们从事救国工作才一年多，不配受欢迎，郭先生多年来始终不懈地指导我们，在文化上贡献极大，是应该受到大家欢迎的。并强调抗敌工作应强调统一，“即统一于认识，统一于民主，统一于行动。”李公朴先生的发言强调两点：一、敌人最怕我们团结，要谨防敌人挑拨分化；二、不应低估自己，高估敌人。

嗣后，由留日回国的学生代表郝子报告在日受压迫的情况及日本人反对侵略战争及日本国内经济恐慌等状况。

最后，文化界救亡协会理事会提请推郭沫若、沈钧儒、邹韬奋、李公朴、章乃器、王造时、沙千里及史良等八人为该会理事，并经大会一致通过。

二、关于南市别动队

“八一三”后，我从租界区转到南市区工作。开始筹组一个半武装的群众团体。集中生活地点在市商会的三山会馆。

这年暑假，国民党办了个为期一、两月的军训，专门训练店员及小厂工人。我们通过大同大学的进步学生的争取，请该校几位军事教官为我们培训队伍。

我们组织起来的第一支队伍，叫南市别动队，名字是我所起。

这支队伍共有四十余人，由三部分同志组成：一批是大同大学及大同附中的学生；一批是江南造船厂内福建籍工人，系大同大学进步学生发动并吸收进来的；一批是职业救国会的成员，他们多数参加过在杨树浦唐山路的沪东工人业余读书会，后因工人读书会已不能开展活动，其中一部分成员被我动员来参加南市别动队。我那时在上海复旦大学读书，也参加过这个读书会，并做点读书的辅导工作。同时参加的还有，一位原在职业救国会工作的汪光焕。

南市别动队分成四个小分队，内有一个小分队是女子分队，分队长是大同大学女学生丁佩瑜（是我的爱人），南市别动队的负责人是朱克光（即周克）和刘沛林。我们的目的，是争取到枪，使这支队伍成为合法的半军事组织。

别动队集中在南市的三山会馆，这是周恩来等同志领导上海工人第三次武装起义的南市指挥所原址。白天，大家在那里学习时事形势，上理论课，上军事操练课。晚间，巡逻放哨，参加南市地区的治安维持，搜索汉奸特务等锄奸活动。向群众宣传抗日，开展歌咏活动等。

国民党军训系统对这支队伍很不放心，最后没有发枪，枪只供操练用。尽管我们处境十分艰苦，但困难压不倒大家的抗战决心。没有钱，自己筹；没有给养，自己筹粮，自带行李。

不久，南火车站惨遭敌机轰炸，我们在南市龙门村的一个居民住所，将别动队的一部分同志重新组织为八一三战时服务团，公开招收人员，从事宣传、歌咏、救护等活动。少数团员到过淞沪前线直接参加支前服务，女团员曾到现在的卢湾区中心医院里去慰问和救护伤兵员。时间持续了一个多月。

八一三前夕，张爱萍同志自延安来上海，组织中共江苏省委军委，十一月，省军委成立。张爱萍同志任省军委书记，省军委由

回忆录

张执一、余立金、吴克华、彭林、陈家康等组成。遵照上级指示，我从南市别动队和八一三战时服务团两个组织中挑选了一批骨干，并且将救国会中的部分同志也集合在一起，去参加一个军事组织。后来这支队伍编入苏浙皖别动队，为一个大队，有三、四百人，活动在南市四明公所一带。

不久，江苏省委和八路军驻沪办事处利用矛盾，争取了杜月笙，使我们这支队伍取得了合法的地位，国民党政府给我们发了枪。武器大部分是短枪快慢机，少量是步枪。队伍在南市经过一段时间的集训就开到漕河泾去了。后来，敌机轰炸华漕镇，队伍惨遭损失，约摸一个中队的成员伤亡。一九三七年十一月十二日，随着国民党军队从淞沪前线撤退，我们这支队伍中大部分人员回到租界区，重新转入了合法的隐蔽斗争。

（中共上海市南市区委整党办公室 吕虹、施福龙访问整理）